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
[美]马修·斯坦利
孙天译
译林出版社

爱因斯坦背后的人

□李北园

人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他的理论，但对一般人而言，却鲜少有知道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的。爱丁顿是那个站在爱因斯坦后面的人。

爱丁顿1882年出生于英国，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1913年获得剑桥大学天文学和实验物理学的终身教授，次年成为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1915年，就在爱因斯坦完成相对论之后不久，爱丁顿就了解到了这一最前沿的理论，并被深深折服。

早在1915年之前，爱因斯坦就开始相对论的研究。他先是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聚焦于讨论惯性参考系的物理现象。但狭义相对论假设中的惯性系本身无法被定义，也无法解决引力问题。因此，爱因斯坦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他大胆预言，时间和空间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光线是有重量的，重力会让光线弯曲。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四维宇宙，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扭曲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但却苦于无法证明。富有实践精神的爱丁顿提出，要组织一支考察队去进行观测日全食，并验证爱因斯坦的理论。遗憾的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整个欧洲，英国政府不支持爱丁顿的主张。最终在爱丁顿的坚持下，并通过一些科学家好友游说，政府和爱丁顿达成协议：如果战争能在1919年5月之前结束，就允许他带着队伍去进行观测。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约定兑现。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为取得最佳观测效果，组织了路观测队：一路是皇家天文学家戴森带队，去巴西的索布拉尔；一路由爱丁顿亲自带队，去西非的普林西比岛。

爱丁顿观测队在1919年4月下旬到达普林西比岛，在闷热、暴雨和蚊虫肆虐的艰苦环境下做好了准备工作。在日食那天早上，岛上风雨交加，爱丁顿沮丧到几乎要放弃。但到日食开始前天气好转。爱丁顿拍摄了多张日食照片，但仅有1张成像非常清晰。经过紧张的计算，他和团队成员根据照片得出的光线偏转值，是1.61弧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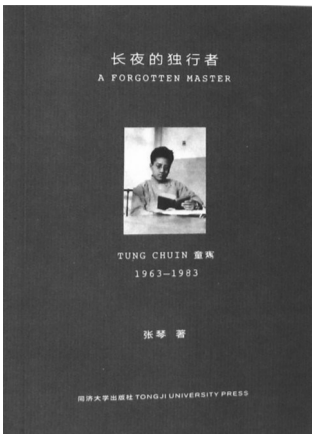
巴西观测队那边艳阳高照，拍了不少照片。但最后冲洗胶片时大失所望，因为阳光太强，底片盒子晒的胶片发生了形变。他们只好做了一定的加工处理，得到的数据是1.98弧秒。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值是1.74弧秒，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也认为光线在强引力场会发生偏转，但牛顿认为偏转角度是0.87弧秒。由此爱丁顿宣布：通过日全食的观测数据，爱因斯坦的理论经受住了考验。

爱丁顿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推向了世界。在科学的圈子里，爱丁顿一直被铭记。在爱因斯坦本人的文集以及后来不同作者撰写的各种版本的爱因斯坦传记里，他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由德国著名传记作家阿尔布雷希特·福尔辛撰写的《爱因斯坦传》，由美国著名导演菲利普·马蒂执导的电影《爱因斯坦与爱丁顿》(2008年)，爱丁顿都是其中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还有纽约大学科学史教授马修·斯坦利撰写的《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其中也给了爱丁顿相当的篇幅。马修·斯坦利拥有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宗教学学位，是《今日物理学》《物理世界》和《洛杉矶书评》的撰稿人，还开设有物理学科普播客“*What the If?*”，他的这部爱因斯坦传，参考了众多权威资料，紧紧围绕神奇的1919年做文章，内容涵盖爱因斯坦充满传奇的一生，书中最亮眼的内容，就是爱因斯坦与爱丁顿的友谊。

爱丁顿是爱因斯坦的贵人。将他们的故事置身于时代的背景之下，就知道“贵”在哪里。从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肆虐，而这段时间也是爱因斯坦学术最为高产的阶段，先后出版59篇(部)成果。爱因斯坦在科学的世界里苦苦求索，战争的硝烟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凿开巨大的鸿沟，有科学家试图证实爱因斯坦的想法，却被当作间谍被捕，原因是爱因斯坦的国籍和族群——他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和他的科学同道中人，被国境线、铁丝网和U型潜艇分割在两个世界。

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也是有种族的，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穿越了战争和民族主义的隔阂，在1919年春夏之交以及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包括爱丁顿在内的勇敢的科学家们用实际行动夯实了国际科学共识的一块基石。正如马修·斯坦利所言：“1919年的日食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并不是说日食本身，因为那只有短短几分钟，而是说这场日食的影响，它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人都用爱因斯坦和日食的故事来解释科学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又意味着什么。”



《长夜的独行者》
张琴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枝带晋时春

□陆远

生命中最后的30多年，童寯教授一直住在南京文昌巷52号，白墙内是一幢英式两层小楼，庭院花木扶疏。我曾曾多次在小院门前驻足，遥想小院主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的升沉宠辱，也曾折服于他论述江南园林的那些经典著作，但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拼出一副童先生相对完整的人生图像，直到读了学者张琴的著作《长夜的独行者》。

张琴是建筑学者，也是童寯的孙媳妇，不过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家族长辈，已在他去世多年之后。那一晚，穿过走廊走进客厅，张琴看到老人在墙上的镜框里瞪着自己。从那以后，张琴花了将近30年去了解童寯，与他的亲友、学生聊天，读他留下的那些文字——书信、日记以至交代材料，她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童寯心灵深处的窗。

童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未必能简单作答。他以研究建筑、设计建筑为毕生志业，却始终是个“非典型”建筑师，中国传统文人那一套情趣、价值和追求，在他的精神世界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在清华读书时，名师云集，童寯私心最仰慕的精神导师是王国维。王先生亲手开列的那张书单，被他随身珍藏多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童寯日后课徒的第一要义。80年代初，童寯成为中国建筑学科首批四名博导之一(另外三位是杨廷宝、冯纪忠和吴良镛)，研究中国建筑史已小有名气的日本学者田中淡慕名投考，童寯的考题是：把《古文观止》中柳宗元的《梓人传》先译成汉语白话，再译成英文，田中淡铩羽而归，而熟读《古文观止》则成为童寯门下弟子的必修课。童寯自己能诗善画，常常沉浸于元代绘画与晚明文学中。1977年，阔别数十年的清华同室林同济教授来访，童寯拾起多年荒废的画笔，以一幅山水立轴相赠，笔下分明有倪云林的气韵。学生吴良镛来看他，他把自己的旧画一张张翻出来共同欣赏，“建筑就那么一点事，画画才是大事”，他亲口对吴良镛说。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又在童寯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记。他从中学开始研习西洋美术，在清华技艺不断精进，留美期间又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他青年时代旅欧期间留下的水彩画中，“一点看不到中国的东西，完全是西方文化激情横溢的产物”。后来担任过中国书协主席的美术家邵宇偶然中看到童寯的作品，惊讶“真不知道中国还有人水彩画画得这样好”。1978年夏天，童寯在后院葡萄架下用打字机写了一封英文长信给长子童诗白郑敏夫妇，郑敏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她用“震惊”形容初读此信的感受，说这是她读过的最罗曼蒂克的写作，完全是19世纪西欧小说的笔法。

童寯是良师。1931年他临危受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3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倾囊相授帮助学生逃难，又号召上海建筑业同仁为这批流亡学生义务补课两年，梁思成称他是“国破家亡之际的一线曙光”。

童寯是挚友。他与杨廷宝两度同学，长期共事，一生缓急可共生死相托，从无“文人相轻”的芥蒂。在童寯心目中，“(我和杨廷宝)在学术、技术、艺术各问题上，没有争论过，不是由于客气或虚心，而是由于看法一致。研究室内在处理问题上，只要是他说过的，我就不重复，完全同意”。1982年童寯因癌症复发前往北京治疗，不想却接到杨廷宝去世的讣告，他挣扎着在病榻上写下悼文。回南京后，他不顾沉疴在身，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童林凤教授骑三轮车看望杨夫人陈法青。

而童寯的精神底色，是名士。从世俗角度看，中国现代“建筑四杰”(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中，童寯大概是“名头”最小的一位，既无院士头衔，更无一官半职，这多少给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一些困窘。不过在童先生自己，这是主动选择，是他出世价值观的体现。梁思成说过，童寯“在学问上和行政上的能力，都比我高出十倍”，却一辈子“逃名鄙利”。1949年后，童寯也曾多次收到“出山”的邀请，从大学院院长到建设厅长、政协委员，却一概回绝。他的孙子童文清楚地记得，祖父的桌上曾放着学部委员(院士)的评审表格，不过只字未填。终其一生，这个“自身”教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心里却有整个家国。晚年他集毕生学养写成英文著作《东南园墅》，小叩而发大鸣，起因是他接待来访的欧洲代表团，对方竟认为中国园林艺术源自日本。老先生坚持用英文写作，就是要在更多的海外读者中消除这种本末倒置的影响。

1983年初，童寯先生在北京拍了最后一张照片，面无表情，静默深沉，像老农，也像高僧，仿佛洞穿一切。张琴说，“隔着岁月，一些人和事会越来越清晰，而另一些会越来越混沌”，而她记录童寯，“也许可以让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自醒”。

蒯言快语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意]翁贝托·艾柯著
王建全译
译林出版社

爱书人的书房

□蒯乐昊

今年我不得不再一次清理了我的书房，那里书满为患，书架上一开始是单层，后来变成双层，再后来连每一格书上方的空间都见缝插针，我一度担心超额的重量会让书架某天轰然倒塌，在书架上找书也渐渐变成一桩不可能的任务。

那些你曾经爱如珍宝的书，如今上了年纪。据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书籍的平均寿命就只有不到七十年的时间了，在无酸纸印刷普及之前，这些书籍极易发黄、变脆，是虫子们热爱的食物。正如翁贝托·艾柯所言，“仅仅用手拿起这些书，它们就会像圣餐面饼一样掉下碎屑来，可以肯定如今制作出来的袖珍书籍也就二三十年的寿命……它们已经未老先衰。”在把这些书收纳进五十个搬家用的纸箱时，书页之间难以被彻底清除的灰尘、虫卵和纸张脆化后的粉末令人喷嚏连天涕泪横流，毫无疑问，它们就是我常年过敏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次清理让我开始反思，我为何要不断地占有更多的书籍？拥有多少书籍才是合理的？那些我不舍得丢弃的书，我珍惜的究竟是一种再次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我曾经阅读时所建立的情感记忆？在喷嚏和反思中，我清理掉了上万册图书。依然不舍得丢弃，只是转移并封存。现在我只剩下一个极小的书架，仅保留了手边需要的百余册图书。

庞大的断舍离之后，我看到了一间令我心仪的书房。主人是位雕塑家，因此他建起了层高极为可观的建筑，来方便他做大型雕塑，工作室旁辟出一间，作为书房，两层楼高，中空，书架由地及天，四壁连廊，有小型楼梯可供上下，藏书大概在四万册，加上艺术家收藏的大多是画册，精美的铜版纸不易变质和虫蛀，看起来整洁有序。我流露出艳羡之情，紧接着问了一个技术问题，“这么多书，找起来一定很困难吧？”

主人微微一笑，告诉我他已经系统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请专业图书馆目录学的朋友帮他整理并建好了书目档案。书房正中，有一铺巨大的书桌，上面平铺着他最近要用的书。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根据自己最近的工作，把可能需要用到的参考书目拿出来提前陈列，一目了然。

这场谈话，再一次把我的记忆引向翁贝托·艾柯，他在他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一书写到爱书人的乐趣与苦趣，尤其写到人们走进藏书室的通常反应，我忍住了向主人提出那个经典蠢问题，“书真多啊！您全部都读过了吗？”

作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兼藏书家，翁贝托说，对这样的蠢问题，他有三种标准答案：第一种是回答“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为什么还要放在这里呢。”这个回答往往会让提问者心生优越感，第二种回答则会让来宾自卑，“我读过的书更多，先生，比这多得多！”但翁贝托还有第三种让提问者感到痛苦惊讶的，也是他的终极大杀器，他会轻描淡写地说，“不，我读过的书都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了，这些是我要在下个礼拜前看完的书。”——鉴于他米兰的书房里有三万卷藏书，这个回答令来访的倒霉蛋如坐针毡，不得不提前告辞。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光看书名很容易令人误解，布满绿色树叶的自然主义装帧也加深了这一误解，这并不是植物学著作，它是一本爱书人对书的迷思：人类为什么需要书籍？翁贝托把书定义为“植物记忆”，以区别之前镌刻在尖塔、金石和墓碑上的铭文，那是矿物载体的记忆。而书籍，从莎草纸到古腾堡印刷术，植物成为人类文明和记忆的载体，人们用碎麻和粗布制作纸张，“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词源都来自“树皮”，植物的记忆，比矿物速朽，却比矿物更易传播。

全世界最稀有的书，古腾堡《圣经》，它已知的第一本也是市面流通的最后一本，在1987年被卖给了日本藏家，价格大概是70亿里拉。世界上所有藏书成癖的人，都梦想着自己捡漏碰到另外一本，翁贝托·艾柯就做着这样的白日梦，但他也深刻地知道，一旦拥有这本书，只能秘不示人，一旦走漏风声，半个世界的窃贼都会活动起来。另一条路径就是把书捐给图书馆，在正厅作为镇馆之宝，用公共财政来支付保安和安保费用。

无论是哪种都是悲惨结局：爱书，却不能时刻自由翻阅，这就是“爱”与“拥有”之间的两难困境。